

重 读 马 克 思 书 系



中国为什么需要马克思

何中华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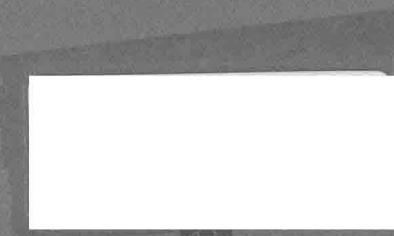


山东城市出版传媒集团·济南出版社



中国为什么需要马克思

何中华 著



山东城市出版传媒集团·济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为什么需要马克思/何中华著. —济南：
济南出版社，2018.5

(重读马克思书系/何中华，丁少伦主编)

ISBN 978 -7 - 5488 -3174 -7

I. ①中… II. ①何… III. ①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中国 IV. ①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76873 号

出版人 崔刚
策划人 杨峰 丁少伦
责任编辑 张静 乔俊连
装帧设计 刘畅
出版发行 济南出版社
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二环南路1号(250002)
编辑热线 0531-86131720
发行热线 0531-67817923 86922073
印刷 济南龙玺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18年5月第1版
印次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
成品尺寸 155 mm×235 mm 16开
印张 10
字数 140千
印数 1—10000册
定 价 48.00元

(济南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联系电话:0531-86131736)

目 录

导 言 / 1

第一章 马克思究竟是干什么的? / 7

第二章 马克思与东方社会 / 25

第三章 马克思与中国的“相遇” / 42

第四章 马克思与中国的“互构” / 67

第五章 毛泽东：一个成功的范例 / 87

第六章 马克思在中国遇到的挑战 / 102

第七章 马克思与中国的未来 / 125

第八章 “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 / 141

后 记 / 157

导言

卡尔·马克思，一位具有雄狮般“大胡子”的德意志人，一位生活在19世纪的伟大思想家，对于我们这些身处21世纪的中国人来说，彼此相差两世纪，相隔两万里。可是，为什么马克思还是不断地被我们谈论，我们又为什么还是那样依然绕不开他？这类追问一再地被重复，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下，它总是折射出追问者的不同期待视野。其实，问题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我们当代中国人无可逃避这样一个基本事实：马克思的思想早已渗进我们的血液和心灵，早已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现代史和当代史进程，并内在地介入我们的现实生活，变成了我们的“此在”性。

实际上，“马克思”已经远远超出了个人的范围，他不仅仅是指一个人，更是一种伟大学说的奠基者和创立者，一种科学理论体系的化身，一种崇高而坚定的信仰之象征。就这一点来说，马克思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符号，他以集大成者的角色，浓缩了此前的一切人类思想的精华，同时又以先知般的姿态预告了未来人类社会的基本走向和历史趋势。世界上没有哪个人能够像马克思那样，以其巨大的思想力量，深刻地影响并改变了人类历史进程，改变了人类历史命运。马克



思的学说以其非凡的实践能力对于历史的能动建构，使得一切其他的学说相形见绌、黯然失色。它由此成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一种影响广泛而深远的思想体系。

有人认为，产生于19世纪上半叶的马克思学说，到了21世纪的今天早已经过时了；而且中国作为东方大国，也不需要由一位来自西方的思想家作为我们的精神领袖；况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也有过起伏跌宕的惊险，其中有挫折和失误，甚至是惨痛的教训。还有一种看法，认为马克思是革命的象征，在我们这样一个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其革命家的形象早已不合时宜了，如此等等。所有这些，看起来都似乎能够成为某些人拒绝马克思的颇具说服力的理由。然而，倘若着眼于历史的长时段，跳出狭隘的感伤主义的限囿，我们就不难发现，这类看法貌似有理，其实很肤浅。那么，马克思的学说究竟是“过去时”的还是“现在时”的，抑或是“将来时”的呢？这无疑是我们必须直面的问题。

作为中国人，我们更不能不追问：中国究竟为什么需要马克思？给出这个问题的历史理由、实践理由和学理上的理由，正是我们今天在反思历史、瞻望未来时所要做的工作。对此，我们无法回避，只能面对。

1848年，马克思和他的思想伙伴恩格斯在其著名的《共产党宣言》中，一上来就说了一句颇具隐喻意味的话：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①

这样一个“幽灵”，其实并未局限于欧洲；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竟然游荡到了东方，来到了中国“安营扎寨”。它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人对于自身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的认知，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人对于整个世界格局的了解，而且通过它的“理论的彻底性”及其“实践能力的明证”，实际地建构并塑造了中国的现当代历史进程和社会形态，包括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如今，“幽灵”早已不再是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71页。

幽灵，而是变成了一种我们每个中国人都能够切实感受到、并且都不能不直面的现实的物质力量。它真切无比，其影响至深至远，没有谁可以无视它的存在。

马克思认为，“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①。马克思的学说本身在东方的实现，满足了马克思为理论所确立的这个标准。我们知道，一个理论的彻底性就在于，它提出的诉求必须是自我适用的；倘若一个理论立下的规矩，只能用来裁决别人，而不能运用于自身，那么这个理论在逻辑上就一定是不彻底的。马克思的学说不是这样，这也正是它之所以具有说服力的一个重要原因所在。正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②

尤为擅长思辨的德意志民族，为整个人类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哲学。马克思学说作为德意志民族思辨传统的集大成者，就是对整个人类做出的最伟大的贡献。马克思说得好：“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他们的全部价值仅仅在于：每个民族都为其他民族完成了人类从中经历了自己发展的一个主要的使命（主要的方面）。”^③ 随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中华民族能够有机会从中分享马克思学说这一积极的思想成果。

晚清以降，西方列强凭借其“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华民族在这种强劲冲击下严重受挫，遭遇到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不仅国门洞开，而且“天朝上国”的自圣情结在此打击之下，前所未有的失败感和挫折感尤为强烈而刻骨铭心。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在空前的困顿中左冲右突，急于寻找“救亡图存”的有效“药方”。这种“苦斗”所带来的悲壮和磨难，是为那些未曾经历过这种特定历史情境的民族所难以理解和领会的。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9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9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257页。



中国究竟向何处去？中国未来的出路究竟何在？这个紧迫的时代课题，突然间尖锐地摆在了国人面前。“旧的”行不通了，“新的”也显出颓相；东方的古典文化不济事，西方的近代文化也令人怀疑。中国的老一套不行了，不济事。毛泽东早在1919年就说过：“中国的老法，实在有些不够用。”^① 30年后，在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1949年9月16日）一文中又强调：“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即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②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不仅打击了西方人的文化自信——德国历史学家施本格勒发表的《西方的没落》一书，不啻是西方文化信心失落的征兆，而且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对于西方近代文明的信心。20世纪初，梁启超到欧洲各国周游一遭后，写出了《欧游心影录》，竟然宣告“科学的破产”。老祖宗留下的东西不管用了，西方近代资产阶级传来的东西也不怎么值得信赖。中国走到了十字路口。那么，究竟路在何方？可以说，这是当时摆在一切关心中国历史命运的人们面前的一个最紧迫也是最难以逃避的时代课题。

“五四”前后，随着“西学东渐”，西方形形色色的学说纷纷在中国文化舞台上粉墨登场，一时间流派纷呈、学说迭起，使国人顿感眼花缭乱，几乎是无所适从。几经博弈、争辩、筛选和尝试之后，人们发现这些学说大多是些花拳绣腿而已，真正对于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能够济事、可以用于救世的着实不多。就是在这种苦闷、彷徨和徘徊中，左冲右突的中国人才渐渐觉悟到，只有“第三条道路”才值得一试，才值得选择。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告了“西方的没落”，却催生了“俄国革命”。正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样，“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③。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一九一二年六月——一九二〇年十一月）》，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第33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513—1514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471页。

马克思主义作为“舶来品”，之所以能够被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所选择下来，绝不是偶然的，毋宁说它是历史的风云际会导致的结果，这当然包括错综复杂的因缘、跌宕起伏的时势、稍纵即逝的机遇等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因此，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被越来越多的国人认同，完全是中国当年所面临的亘古未有的大变局给“逼”出来的，而不是哪个天才人物头脑发热或情绪激动的结果，可谓时势使然、势所必至。

有人拒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似是而非的理由不少。择其要者，无非有这么几条：一是马克思是西方人，马克思主义不合国情；二是中国的历史尚未成熟到这一步，当时引进马克思是搞早了、搞糟了；三是中国社会主义历史实践遭遇挫折，证明马克思那一套不行；四是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上半叶，到了21世纪的今天早就已经过时了。这类说法，貌似有理，颇能迷惑一些不喜欢认真思索的人，实则经不起严肃认真地仔细推敲和理性拷问。

首先，真理是没有国界的。我们不能说牛顿三大定律因为是英国人发现的，到了东方，到了中国，它就失效了。马克思主义作为真理具有普遍性，它不单单是为德国准备的，也不单单是为欧洲准备的，而是为整个世界准备的。以不合国情为理由拒绝马克思，完全无视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适性意义。每个国家的具体国情当然必须正视，这也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得以发生实践效应的绝对前提。但这不能成为拒绝马克思的理由。

其次，马克思的学说对于晚清以来的中国而言并不是一种“奢侈”，说它太超前，正是基于一种线性历史观而得出的误判，是缺乏“世界历史”意识和全球眼光的表现。当中国已然被纳入世界整体格局之后，考虑中国问题就不能再局限于中国本身，不能再把中国作为一个孤立自足的系统看待。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蔡和森、毛泽东等一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对此早就已经有了足够的自觉。当中国被作为世界的一个内在的有机部分来看待时，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的建设性意义就格外地分明地凸显出来了。



再次，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创造了成功经验，取得了历史性成就。这是举世瞩目、有目共睹的。任何一个不怀偏见的人，都不能不正视这一点。当然，无须讳言，我们在探索的过程中也发生过失误和挫折，有些甚至是全局性的沉痛教训，付出过惨痛的历史代价。但实践上的负面效应，从总体上说不是马克思学说本身的必然产物，在很多时候恰恰是违背或者误读马克思的结果。我们需要的是正本清源，是重新认识和理解马克思，而绝不是告别马克思。

最后，有人认为马克思“太老了”，一个产生于19世纪上半叶的学说，到了21世纪难道还不过时，还值得我们孜孜以求地去追随吗？这种怀疑不懂得马克思的学说并不是一个已完成的、封闭的、自足的体系，相反，它是向当下的时代、鲜活的实践、遥远的未来敞开的。马克思的学说正是在同时代、同实践、同未来的对话中不断地与时俱进的。而且，马克思所追求的“哲学的世界化和世界的哲学化”这一理想，使得他的学说在共产主义来临之前将不会失去其批判和反思的能力。马克思就曾说过，“哲学的实现同时也是它的丧失”^①。显然，在马克思那里，哲学只能“终结”于它的实现。而马克思所秉持的实践唯物主义的实现，也就是共产主义的来临。因为“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同“共产主义者”是同义词。

有人疑惑，可以承认马克思主义在当年确实是历史的选择，但历史的选择并不是一次性的，难道我们一旦选择了，就一劳永逸、一成不变了吗？难道历史不可以、不应该进行重新选择吗？这是今天马克思主义所遇到的一个真正的挑战。有人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学理上，在当代中国都面临着一种合法性危机。若对这类挑战做出必要而有效的回应，那就让我们再次回首马克思，回首马克思同中国的相遇和“互构”，瞻望一下马克思与中国之关系的未来吧。当我们更真切地了解学理和历史层面上的蕴含之后，还需要刻意地为马克思及其对中国的必要性之意义做出某种辩护吗？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卷），人民出版社，1982，第258页。

第一章 马克思究竟是干什么的？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马克思的形象是既熟悉又陌生。说熟悉，是因为他与我们的国家、社会、制度安排，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和观念，乃至深层的集体无意识，都息息相关；说陌生，是因为他的学说和思想到底是什么，其真谛又究竟在哪里，这些问题的答案在人们心目中似乎又并不是十分清晰。

要想理解中国为什么需要马克思，一个前提性的问题必须首先解决，这就是：马克思究竟是干什么的，或者说马克思的学说，它的最主要的内容大致包含些什么？我们对于马克思其人，特别是其思想形象，要有一个大体的轮廓。因此，有必要用最简明的话说一说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和他的理论诉求，以及他的学说的实践品格。

1818年5月5日，马克思出生于普鲁士特利尔城的一个律师家庭。生活优裕的他，其实完全可以走另外一条路，但却选择了一条充满荆棘和磨难之路。他立志扮演一个普罗米修斯式的角色，也就是牺牲自己、拯救人类。应该说，青少年时期的马克思就确立了远大的抱负和志向，有着强烈的拯救情结和牺牲精神。17岁的马克思，还是一位中学生，就在作文《青年在职业选择时的考虑》中认为：“如果



一个人只为自己劳动，他也许能够成为著名学者、大哲人、卓越诗人，然而他永远都不能成为完美无疵的伟大人物。”^① 马克思的志向绝不是那种局限于自私的“成功”，而是超越这种狭隘性，决心“为人类工作”。所以，他在这篇作文的末尾写道：“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② 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马克思一生贫病交加，却能够义无反顾地牺牲自己的健康和私人的幸福，为了拯救人类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在自己的博士论文序言中盛赞普罗米修斯，说“普罗米修斯是哲学日历中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③。其实，马克思本人正是他所在的那个时代的人间的“普罗米修斯”。

马克思在其一生中，有相当长的时间在经济状况上遭遇的窘迫完全超乎常人的想象。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1859年1月21日）中，曾自我解嘲地说：“未必有人会在这样缺货币的情况下写关于‘货币’的文章！”^④ 他甚至贫困到连邮寄研究货币的手稿（即《资本论》）的邮费都支付不起。1852年10月28日，马克思的夫人燕妮·马克思在一封通信中说：“同这种以金钱和一切斗争手段武装起来的官方势力做斗争，自然是很有意义的，如果斗争的结果是我们胜利了，那就更加光荣，因为对方拥有金钱、权力和其他一切，而我们却常常不知道怎样才能弄到写信的纸，等等。”^⑤ 离开了坚定的人生信念，很难想象马克思能够在如此艰难的生存状况下支撑下来，并取得不朽的理论成就和做出辉煌的革命事业。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卷），人民出版社，1982，第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卷），人民出版社，1982，第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卷），人民出版社，1982，第190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十九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371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八卷），人民出版社，1973，第650页。

长期而艰苦的思想劳作，极大地伤害了马克思的健康。但他认为：“科学绝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享乐，有幸能够致力于科学的研究的人，首先应该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① 正是这种高远的志向和理想，使马克思有足够的勇气克服种种私人的不幸，以忘我和牺牲的精神进行紧张而繁重的哲学运思和建构。李卜克内西在回忆录中感佩地写道：“马克思工作中的坚忍精神常常使我惊叹不已。他孜孜不倦，即使身体垮了下来，也毫不松懈。”^②

1883年3月14日下午两点三刻，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一颗伟大的头颅停止了思考，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在英国伦敦梅特兰公园路41号自己的家中与世长辞。3天后，也就是3月17日，马克思被安葬在伦敦北郊的海格特公墓。

在马克思的葬仪上，恩格斯发表了那篇著名的《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他强调说：“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应该说，这个定位非常准确地把握住了马克思终其一生所扮演的最为重要也是最为突出的角色，可谓是恰如其分。它把马克思一生最突出的特点和本质凸显无遗。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他（指马克思——引者注）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③ 不是说马克思从小就头长反骨，天生就喜欢革命。世界上没有谁生来就倾向革命的，革命是要掉脑袋的，是要做出巨大的牺牲和奉献的。说到底，革命是被逼迫出来的。对于马克思来说，这首先是他的哲学信念和哲学立场的内在要求。你要成为一个“实践的唯物主义者”，你就必须诉诸行动，“实际地反对和改变现存的事物”，从而“使现

① [法] 保尔·拉法格：《忆马克思》，载中共中央编译局编：《回忆马克思》，人民出版社，2005，第187页。

② [德] 威廉·李卜克内西：《纪念卡尔·马克思——生平与回忆》，载中共中央编译局编：《回忆马克思》，人民出版社，2005，第6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777页。



存世界革命化”^①。这正是一个革命家的典型的姿态，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天职。

马克思并不是一个盲目的革命家，他是在经过对现实和历史加以深刻反思的基础上从事革命实践的。毋宁说，马克思的全部运思和哲学建构，归根到底都不过是要使整个无产阶级自觉地意识到为什么必须由“说”回到“做”。马克思早在1845年春在布鲁塞尔写的那个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以结论的形式宣告：“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②从而宣示了自己的新哲学，也就是他所致力于建构的那种所谓的“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③。马克思的哲学，构成无产阶级由自在到自为、由自发到自觉的理论条件。

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作为哲学家，无疑有其足够的正当性和必要性。但他从来不是直接去“谈论”哲学，而只是在自己的实际运思中“显现”哲学。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的思想建构中，哲学不是作为被探究的对象而存在的，而仅仅是马克思的实际运思方式本身，它只能实际地体现在马克思的具体运思当中。事实上，这才是哲学的最为本真的因而也是它所应有的存在方式。所以，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我们几乎找不到关于哲学本身及哲学有关范畴的定义性的表述。可以说，在马克思那里并不存在一种作为研究对象和叙述对象的哲学。这一特点是由马克思所秉持的特有的哲学观决定并要求的。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对马克思盖棺论定，在总结马克思一生的卓越贡献时指出了两大理论成果，即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恩格斯强调指出，“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75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57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56—57页。

规律”。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奠定了马克思在人类思想史上的不朽的地位。诚如恩格斯所说的，“一生中能有这样两个发现，该是很够了。即使只能作出一个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的了。”^①

其实，在马克思那里，唯物史观就是他的全部哲学，也就是说他的学说并不存在一个独立于唯物史观之外的其他部分。因此，对于马克思来说，唯物史观完全是广义的，不仅没有一个辩证唯物主义部分同它相对而言，也没有一个外在于历史观的经济学部分或者科学社会主义部分。而剩余价值理论也并不是同唯物史观相并列的独立学说，而是从属于唯物史观并为其提供现象学叙事的它的有机组成部分。马克思的整个学说无疑是一个有机整体，就像马克思对于自己的《资本论》所做的比喻，即“一个艺术的整体”^②；而绝不是“一袋马铃薯”，不是“各种知识的杂拌”^③。在马克思那里，从来未曾有过独立的哲学，或经济学，或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当然充分地借鉴和利用了许多传统学科的知识，诸如人们所熟知的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宗教学、人类学、文化学等等，但当它们被批判地援引到马克思语境之后，就改变了它们在原有学科中的性质和意义，已然构成马克思的人的存在的现象学的叙事的一个环节或方式了。这正是“格式塔”和“系统质”的性质或特点所在。让我们仔细想想，马克思的哪一本著作是单纯哲学的，或是单纯经济学的，抑或是单纯科学社会主义的？恐怕一本也找不到。其实，马克思的每一本著作都是高度综合的，像《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像《德意志意识形态》，像《共产党宣言》，像《资本论》等等，按照传统的学科分类，这些里程碑式的著作都无法被纳入任何一个传统学科。因此，在马克思的著述中，传统的知识分类学是不适用的、是失效的。马克思的学说在总体上是哲学性质的。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776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135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15页。



我们原来以为马克思主义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其实不然，毋宁说马克思主义就是广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反过来则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狭义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是哲学的真正解放者。他把哲学真正地广义化了，即由哲学家头脑中的思辨活动变成了人的存在的历史展现及其完成的反思形式。就此而言，与其说马克思给出了一种新哲学，不如说他给出了一种新哲学观更恰当。马克思的新哲学观彻底重构了人们对于哲学的传统理解，从而导致哲学的真正的解放。在马克思那里，哲学不再是一种知识论建构，而是一种运思方式，它所把握的乃是人的存在的历史展现及其完成本身。在马克思的语境中，无论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还是科学社会主义，都不过是他的哲学的一种叙事环节或手段，因而从属于广义的马克思哲学。

让我们以马克思终其一生最重要的著作《资本论》为例。这本书当年在欧洲大陆被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①。人们一般都以为，这部巨著当然是马克思写的最典型的经济学著作。但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在《资本论》中，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同一门科学”^②。他甚至认为：“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1章。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③ 这显然同哲学内在相关，离开了哲学视角，我们就读不懂《资本论》。

如果把《资本论》特别是其第1章当作纯粹的经济学文本来阅读，就根本搔不到痒处，读不出它的深意。正是在这一章中，马克思对商品本身做了深入分析和考察，揭示了它的二重性，即由具体劳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36页。

^② 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第357页。

^③ 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第191页。

和抽象劳动所决定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作为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使用价值不过是直观的有用物罢了，但它并不构成马克思的研究对象。马克思的目的在于透过物与物的关系发现并揭示被物所掩盖着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关于“商品”，马克思说：“最初一看，商品好像是一种很简单很平凡的东西。对商品的分析表明，它却是一种很古怪的东西，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① 离开了哲学视野，我们就捕捉不到商品的这种“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的性质。正因此，马克思才认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②。这不正是只有哲学方能把握到的吗？

资本主义制度安排把一切都统统商品化了。商品构成整个社会的“细胞”。所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所做的批判性分析，就是从“商品”入手的。简单商品交换的发展，必然孕育出货币。作为符号化了的一般等价物，货币的出现乃是商品交换的客观需要。资本家拿货币去购买商品，作为他追求商品价值增殖的凭借，就构成所谓的资本。所以，在马克思那里，商品、货币、资本之间有一种发生学的关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力本身也变成了商品。作为雇佣劳动者，工人由于一无所有，除了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之外，没有别的办法获得生存资料，所以只有通过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才能活下去。马克思认为，劳动力作为商品，同任何其他的商品不同，它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特点，就是它的被消费是通过活劳动的使用实现的。劳动力在实际运用中所创造的价值，会大于资本家为购买它所支付的价值。资本家用货币购买劳动力，支付的只是雇佣劳动者的工资，也就是劳动力的价格。所以“溢出”的那部分价值亦即剩余价值，就被资本家无偿地占有了。因此，劳动力所创造的价值同资本家所支付的工资之间有一个“差额”，也就是说劳动力所创造的价值大于资本家用来购买劳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8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8页。